

边界、跨域与融通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

吴翔宇

内容提要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同源性。两者的融合拓展了在“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论框架内重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研究视野。针对“泛化”与“窄化”两者关系的理论误区，本文提出“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旨在超越纯文学的本质主义与非文学的工具主义，将两者的互动共生关系置于现代中国动态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系统把握两者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本文在此基础上寻绎区隔与融通两者的机制，梳理其分立与融合的关系形态，辨析一体化研究的可能与局限，为重构立体化的现代中国文学全息图景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中国儿童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一体化；发生学考察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学界有诸多争论。“古已有之”还是“现代生成”的论争，重心不在于考证文学发生的时间节点，而是要追问儿童文学本体的性质、机制与价值等“元问题”。抛开学术论争的缠绕，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同源性，两者的一体化融合了百年中国演进的“现代”命题。因而，在“儿童的发现”纳入“人的文学”整体系统时，有待于将“儿童文学的发现”置于中国新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予以考量。引入发生学的方法来考察两者的关系，能将“观念发生”与“事件起源”统合辩证^[1]，通过探究认识结构的生成来把握推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综合性力量，为理解其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提供新的研究路径。显然，这种关系的重构并非基于历史推进而做的文学史内容的添补，而是围绕着两种文学的边界、跨域与互通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何在现代中国动态文化语境中廓清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在“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坐标中将两者纳入整体而系统的“现代中国文学地图”，是当前学界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命题。

一 误读与重审：两种文学“一体化”的提出

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文学系统可区分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两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子系统。客观科学地梳理两个子系统的关系，将深化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内部结构及发展规律的理解。寻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史，不难发现：由于固守学科“本位”，没有合理融通学科个性与共性，学界尚未在整体的思维视域下来梳理两者的关系，以致于出现了曲解两者关系的现象。具体而论，主要出现了如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误读：

第一，中国儿童文学被视为现代文学的附属形态。从发生机制来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发生本源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人的发现”是“人的文学”产生的基石，在此基础上，“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2]。作为“人的发现”话语结构中的有机组成，“儿童的发现”驱动

了现代儿童观与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现代话语深层次地塑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精神品格，围绕着“儿童”而展开的儿童文学实践与现代文学的新人想象有着共同的旨趣。在此框架中，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游离出现代文学的主潮外。在专职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之前，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者、翻译者、理论批评者的文学活动兼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两个子类，两者并行不悖，合力推动了中国新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但这样一来，兼具成人与儿童“双逻辑支撑”^[3]的中国儿童文学必然会放大成人作家理解儿童审美意识的有效性，从而使“儿童的文学”与现代文学领域中“儿童视角的文学”混为一谈，儿童文学被视为现代文学整体“大厦”的一个部分。由此，寄生的境遇、错位的主客结构使得中国儿童文学难以彰显其学科特性。这种忽视了儿童文学特殊性、无视儿童与成人主体间性的观念必然会弱化儿童文学学科的性质，也模糊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本有的界域。

第二，中国儿童文学被理解为与现代文学迥异的形态。为了创构儿童文学，先驱者以“复演论”为理论武器，通过强化儿童与原始人的共同性来拉大其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性。由是，在确定原人文学为现代文学“他者”的前提下，将儿童文学“发明”出来^[4]。显然，这不是一种直接赋名的立论逻辑，对儿童文学的界定正是构筑在其与成人文学分离的基础上。从表面上看，这种分离有助于儿童与儿童文学主体性的确立。然而，以“他者”来建构“自我”的界说方式，无异于削足适履，必然会抑制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沟通。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动力资源，“儿童本位观”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儿童与成人的“二分”假设，结果在“发现了儿童”的同时也“孤立了儿童”，进而误入熊秉真所谓“破坏性措置”的理论怪圈中^[5]。而戴渭清“成人有成人的文学，儿童有儿童的文学”^[6]的观点正是依循上述非此即彼的逻辑来立论的。以“不是成人文学”作为界定儿童文学的话语策略，其实质是设置了绝对化的“界线”，也切断了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融通的可能性。

应该说，上述误读的症结在于“泛化”或“窄化”地理解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事实

上，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既非从属关系，也绝非异质的形态。两者的深微关系融聚于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将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纳入一体化研究的视野，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生成^[7]。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冰心、叶圣陶等人自觉地将儿童文学实践纳入新文学创作与批评之中：“儿童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儿童既是历史、文化、社会的存在，又是一种具有完全生命的存在。儿童的发现、解放与书写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更新的需要，也牵动了整个文化体系与文学格局的变革。儿童主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场不仅延展了“人学”的文化内涵，而且刷新了现代文学深层的话语结构。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儿童文学参与了先驱者构建新文学理想及推动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两者丰富的联动，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及中国新文学整体演进的一面镜子。

从概念的词源学上考究，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是成人而非儿童。对此，佩里·诺德曼的解释是儿童没有超越“儿童所体验的童年或儿童式思维”，因而“逾越儿童文学的界限”^[8]。这样一来，创作者与读者的“非同一性”必然衍生成人与儿童代际话语冲突过程中的“异”的问题。为了驱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生，先驱者以“儿童本位观”为理论武器，译介外国资源、整理传统资源以及开展本土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从一个学术概念转换为学科概念。儿童本位观的基本内核是“儿童是人”与“儿童非成人”。表面上看，该观念所生成的儿童与成人的二分，有助于儿童主体性的确立。既然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截然分立，那么成人又如何能创作出以儿童为本位的作品呢？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直接表现在“为儿童”还是“为成人”的两歧诉求上。因而，如果不能扩充儿童文学的研究框架，将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置于“大文学”发展的整体系统中予以考察，实难真正理解作为一种“文类”或“文体”的儿童文学在现代中国语境里的“暧昧性”^[9]。解决上述难题的方法是融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做到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儿童文学本身，彰明中国儿童文学之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二是回归现代中国的历史

现场，在文学与社会发展同构的思维视域下考察两种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血肉联系。上述两种返归实质上体现了研究者在动态语境下统合“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理论自觉，兼顾了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基于此，中国儿童文学也因其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没有自我本质化，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性恰恰体现在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既独立又融合的关系上。

毫无疑问，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得益于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中国古代儿童的主体价值因受成人的漠视而处于边缘乃至被遮蔽的位置，一些受儿童喜爱的读物并非专为儿童而作，并且厚积着成人教化的色彩。“五四”启蒙者高擎“人的发现”大旗，立场鲜明地抨击了传统社会“从来如此”驯化和奴化儿童的行为，力图将那些被异化为“缩小的成人”的儿童从伦理道德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由于斩断了那些黏连着伦理思想的知识 and 依据，儿童以其“新人”或“新民”的身份品格在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宏大议题中获取了合法性价值。在此逻辑框架里，现代儿童观的意义远不止于发掘这种观念的具体表征，而是为了探求一系列关乎人类文明演进及思想观念变迁的重大议题。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正是借助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实现的：“只有成人相信儿童在某些方面与成人不一样，需要一种属于他们的文学，儿童文学才能够存在。”^[10]由此看来，中国儿童文学这种借成人来传达儿童话语的特性恰是“现代性修辞”的表征^[11]，其价值认知也因关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价值实现的文化实践属性而成为现代性的“症候”，也是“结果”^[12]。从这种意义上说，“儿童”与“儿童文学”都是现代的产物。“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话语塑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想象结构与言说方式。

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带动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深刻变革。现代儿童观是舶来品，但它引领下的中国儿童文学译介与创作却是中国化的。一旦聚焦于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儿童问题”及围绕儿童开展的文学想象，中国儿童文学就被缝合于中国新文学的序列之中，其思维观念、价值取向、知识阈限等都与现代中国文学保持着同向的融合关系。必须说明的

是，现代话语在楔入中国儿童文学的结构系统时却陷入了似乎难以自洽的理论困局：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的新人身份为基点，将儿童的成长视为一种从旧到新的现代价值主体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因亲近儿童自然性以及与民间传统的亲缘关系而呈现出的“前现代”特质，却很难为现代话语所接纳。出于融合成人创作意图与儿童审美意识的目的，儿童文学必须要调适“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维持平衡。因而，在参与社会问题讨论、反映社会现实等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同向跟进的速度明显慢于中国现代文学，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时差”，想要在此话语系统中与中国现代文学保持平等对话关系似乎并不现实。

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种专为儿童创作、服务于儿童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本身具备不甘于做成人文学“副本”的品质。然而囿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漠视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其社会功能在与时代的遇合中屡被激活。无论是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于救国救民最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13]，还是茅盾的“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14]，都说明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割裂现实传统，始终与现代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进而形成了如王泉根所概括的“现实型文学体系与文类秩序”^[15]。这种独特现实关怀与审美指向的文学范式显然铭刻了中国“民族性”的印记，自觉汇合于以“文学现代化”为内核的新话语体系中。由此看来，那种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超越现实社会、主动疏离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革命”或“战争”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儿童文学界对“将儿童引到极乐园”^[16]式作品的批评即是显例。

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拥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两者围绕着特定历史情境而展开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无论是柄谷行人将“儿童”视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概念”^[17]，还是彼得·亨特对儿童文学“有用的虚构”^[18]的概括，都强调历史文化语境对于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塑造作用。强调发生学意义上文学与语境的张力关系，有效地规避了将中国儿

童文学导入纯文学的本质主义（“太玄美”）的风险，避免“养成了儿童文学界自成的一块‘飞地’的自我统领、自我逍遥以及自我蒙蔽的自足精神”^[19]。与此同时，在现代中国动态文化语境中，也要强化儿童文学的自主性，防止跌入另一极端——非文学的工具主义（“太教育”）的窠臼中。

二 区隔与融通： 整体演进的动态关系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需要一种统筹意识，有必要将其夯实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态语境中，才能予以区别、辩证与融通。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都是以“文学现代化”为内质的文学形态。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三个核心关键词上均有不同的内涵，集中表现为“一个现代的发明”^[20]。与现代文学相似的是，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形态，其思想观念、语言形式都具有新建性。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与域外资源的中国化借鉴对于两种文学范式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发生学意义。对于上述内外两种资源的化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都秉持“中国”的价值标尺，其文学实践始终围绕着“民族化”与“现代化”而展开。

一般而言，差异性是区分两个概念的重要属性。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对话的基础正源于标示自我的特殊性。对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学界向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教育的“方向性”，也有人认为是儿童的“年龄结构性”，还有人将其归结为独特的“文体分类”。究其实，上述看法过分倚重“儿童性”或“文学性”的某一层面，未能从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代际交流的视角来辨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此后儿童文学理论界关于“本体论”和“建构论”的论争。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儿童文学的真正特殊性在于“其作者与读者年龄代层间的落差所造成的审美意识方面的差异”^[21]。要言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儿童”独特性的单一维度上，还包含了儿童与成人“两种人格主体”的对话关系。其中沟通儿童与成人的精神桥梁是童年，而“两代人”围绕童

年所展开的对话是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重要维度。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从“儿童的”与“文学的”两个层面来概括“儿童文学”的独立品格^[22]，这为学界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奠定了学理基础。针对“儿童的”特殊性，方卫平主张从“静态的结构观点”和“动态的建构观点”^[23]来考察，藉此共构儿童接受机能的阶段性与儿童文学的独特性。此后，班马从儿童的“元状态”来探析儿童文学的“前艺术”和“前审美”^[24]，也基本延续了上述思路。应该说，这种以儿童发生认识论的视点来探索儿童文学特性的思路，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主导路向”^[25]，其遵循的是以“儿童的”独特性来推演儿童文学特殊性的思维逻辑，缺憾在于对儿童文学内在的生成原理缺乏系统的考察。

就“文学的”特殊性而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语言风格、叙述方式、文化意蕴等也与现代文学有差异。作为中国儿童文学产生的理论前提，“儿童性”的理论过剩抑制了“文学性”的审美自觉。由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学界对“儿童的”特殊性的关注度远远高于“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也曾一度被视为“教育儿童”的文学。郑振铎曾将儿童文学内蕴的教化性视为其区别于普通文学的重要方面：“普通文学极少含有道德的训条的，更没有用来做传达理科方面的智识的。像托尔斯泰诸位极端人生派的批评家，虽然主张文学应为宣传一种宗教或革命思想的工具，然而多数的文学作品，却都是自然的感情的流露，都是无所为而作的作品，而儿童文学则不然，这也是儿童文学与普通文学很不相同之点。”^[26]事实上，思想性与艺术性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不应该是辨析两者的标尺。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借成人作家传达儿童声音的结构性特征实难真正限制成人教化性的传达，进而使得“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个看似不证自明的观点在现代中国却变得具有了革新性意义。

在阅读对象与等级的差异系统中，中国儿童文学培育了有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儿童阅读群体。与现代文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是相对简单的文学。从表面上看，这种“简单”是为了迎合儿童相对单

纯的情感世界与认知能力，但实际上却体现了“隐藏的成人”对于儿童阅读者的预设与期待，儿童文学也由此被赋予了双重意识：“既快乐地像孩子一样，又脱离那种孩子样，从一种成人视角看待和理解孩子样。”^[27]“快乐地像孩子一样”要求成人拉近与儿童的距离，以近距离“俯身”的姿态来观照儿童，这样才能真正读懂和书写好儿童。“脱离那种孩子样”则主张拉大与儿童的距离，以“非同代人”的视野来看取和理解儿童。由此看来，想要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有切合儿童情感思维和心灵世界的“内在人”的认知，同时又要跳出孤立而自足儿童世界的“外在人”的凝视。显然，儿童文学这种结构特点是成人文学所不需要具备的。由于隐含着“成人知识集”，儿童文学才没有在追求“儿童性”的过程中固步自封，而是以儿童与成人为复合主体的互动来扩充文学的艺术视界。这样看来，周作人所标榜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28]多少带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从创作的宗旨来看，儿童文学不止于再现童年，还有培育文本之外的儿童阅读者的使命。上笙一郎的“培育引导为健全的社会的人”^[29]、约翰·史蒂芬斯的“将目标读者社会化”^[30]、曹文轩的“塑造民族未来性格”^[31]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儿童文学之于儿童未来成长的社会价值。这种自带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思维畛域与审美境地。不言而喻，当中国儿童文学不沉溺于纯粹的想象世界而延展至对儿童生命发展的宏大议题时，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与精神等诸多层面的共同性就构建起来了。尽管“儿童性”是儿童文学本有的核心要素，但是它并不是超社会、超历史的。在《稻草人》的序中，郑振铎就曾精辟地道出了这一事实：“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企图。”^[32]言外之意，中国儿童文学所书写的“儿童性”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并不析离，那种追求纯粹“童心主义”的观念因缺乏社会人生的烛照而难免堕入狭小而真空的幻境。由此可见，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交互结构特征、培育读者的社会功能，都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没有沦为盲视现代中国的“孤岛文学”和“真空文学”，而是内在地统合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中。

想要理性地辨析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除了要开掘各自的特殊性，还需把握其共同性。关于这一点，蒋风的观点可谓切中肯綮：“我们在谈儿童文学时，首先应该认识它与成人文学的共同性，更不要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33]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同属“文学”范畴，又都具有“文学现代化”的学科性质，这为两者一体化研究提供了可能。归结起来，两者的共同性至少包括如下三点：一是用现代白话文作为书写形式。二是遵循文学现代性的思想主轴。三是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觉的儿童文学的缘由，除了陈旧的儿童观外，另一重要方面是“语言和文字不一致”^[34]。文言本身的模糊性、多义性、隐喻性以及言文不一致的特性不利于儿童的阅读与接受，白话文所具有的“口语性”则契合了儿童文学的现代发展，起到了以形式“固化”思想的作用^[35]。语言变革是一场思想革命，言文一致意味着现代思想与现代语言的同向促进，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文学现代化的场域里，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都被内化于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的流脉中，进而夯实了两者一体化研究的基础。

往深层推究，想要探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问题，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是持守实证与思辨的发生学方法，探寻两者的“联结点”，从起源处开掘两者析离或融合的发展脉络。藉此，我们能筑就一座从学理层面进入文学史、进入两种文学发生发展内部的桥梁，进而探求两种文学交互的内在机理及关系形态。概论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融通的逻辑基点是人类的共通性与时代的同一性。基于人类性与时代性的召唤，中国儿童文学从狭窄的儿童话语空间走出来，在现实与幻想的“双翼”中找寻平衡，其固有的特殊性内化于现代中国生存发展过程的时代主题和共通的文化命题。自诞生之日始，中国儿童文学始终着眼于“儿童”这一“新人”的成长与发展，并持守育化新人的价值认知来融入民族国家想象的现代传统中。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对于“儿童”这一全新主体的文学想象和价值建构问题上。确立了儿童这一价值主体，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也就确立了，“其

价值内涵不止于一种文学范式的转换或更新,更为重要的则是以儿童为节点和方法,勾联出儿童与社会、历史、国家等诸多维面的复杂关联^[36]。基于此,中国儿童文学没有超逸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也从未脱离现代中国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当然,即便如此,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也并未泯灭。正是基于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多元存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才没有撑破一体化的张力结构。透过两者的关联轨迹,能清晰地洞见两种文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也能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

三 张力与局限：“一体化”研究的反思

从语义上看,“一体化”是指相互独立的实体通过某种方式在同一体系下彼此包容、合作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在整体化的视野中呈现出结构性、系统性的运作样态。一体化研究的重要品质是整体而综合地研究问题,它要求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统摄带有规律性、系统性的重大问题。同时,它并不是以共性来漠视个性,而是辩证地理解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论及“同一性”与“共属性”的问题时,海德格尔将人与存在的关系视为“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性”^[37]。应该说,这种“共在”与“共属”的思路对于探究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都从属于中国新文学的序列,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痛感于儿童文学自我本质化所造成的后果,班马率先呼吁要突破儿童文学“自我封闭系统”,倡导从“自我封闭”走向与社会、世界、各学科领域紧密联系的“开放式”儿童文学系统^[38]。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走出自我封闭系统的有效途径是在世界儿童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格局中来梳理其整体演变的轨迹,总结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以期更好地融入标示中国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

事实上,以整体观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例证并不少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的一种

尝试。该研究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视为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39]。它超越了以往“静态”或“零碎”式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互视的时空节点来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过程及内在规律。在这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体现为一种研究视野与方法,即以文学发展演变过程的整体性、系统性来考察现当代文学,进而确立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体化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或国家权力话语的代名词,也并非以“一元论”思维来遮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共生。在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组织化”时,洪子诚也启用了“一体化”的概念。在他看来,一体化思维并非一劳永逸,在发掘这种话语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也要警惕其限度。他的基本判断是:“文学的演化过程”视野的确立是考察“一体化”的基础^[40]。换言之,在文学发生发展的动态结构中,一体化的生产机制与组织方式才能整体而深入地贯通起来。因而,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问题时,我们并不是要以一种文学“合并”或“覆盖”另一种文学,而是将两者纳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从而在历史化的视野中深刻把握两种文学的独特个性及双向联动。

用上述方法来观照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可行的实践方案至少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系统把握两种文学各自发生发展的历程;二是将两者置于现代中国转型的动态语境中予以考察;三是整体、系统地梳理两种文学分立、融合等关系形态。回到学术史现场,如果说班马首倡“走出自我封闭圈”的设想延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边界,那么朱自强则尝试现代文学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的“打通”^[41]。由单边拓展向多边融合体现了学界开拓创新的学术勇气。两种视域的融通驱动了多重话语空间的开启,由于共有的、整体性的结构关系,两种文学的思维形态、价值定位、艺术品格不但没有被遮蔽,反而越发清晰与明显。不过,目前学界的此类研究仅停留在中国儿童文学“跨域”的构想层面,并没有围绕“一体化”这一核心议题做足文章。对于两者为什么要“一体化”,何

以能“一体化”，“一体化”的关节点何在，“一体化”的过程怎样，“一体化”研究的价值与局限何在等一系列问题缺乏缜密而深入的学理考察。

纵观两种文学的贯通研究，目前学界已有如下两种研究思路值得关注：一者，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儿童视角”来展开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与边界的讨论。二者，借助于“童年书写”，构筑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交流互动的的话语空间。在这里，“儿童的视角”不等同于“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视角”与“儿童的视角”也不是一回事。在儿童主体价值没有获取充分重视的中国古代，儿童视角是缺席于各类文体的。当儿童的主体意识浮出历史地表后，儿童视角的切入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反观现实的另一种视野，“有可能避免覆盖在现实生活中的谎言和虚伪，呈现出生活本身毛茸茸的原生态情境”^[42]。诚然，在鲁迅、萧乾、萧红、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笔下，儿童视角间离了成人主观化的惯常思维，无形中与成人视角所建构的文学世界拉开了距离。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借儿童说事”的作品并不属于儿童文学，因为它们不是专为儿童而创作的，其价值主体与审美指向依然是成人。如果将其预设的读者限制在单一的“儿童”上，必然会曲解作家的创作意图，也窄化了此类文学作品本有的价值与境界。与“儿童文学视角”相比，“儿童视角”的畛域相对狭窄，其适用的范围多集中于叙事类文体，其所拓展的思维领域也仅限于以“疏者”或“他者”来打量成人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单向度的介入，而非多维度的融通。而“儿童文学视角”的引入则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全文本，并深植于其思想本体与审美形式里，为两种文学的对话与交流铺设了更为宽广的路径。

“童年”并非儿童的专利，成人也拥有“童年”。在“童年”的理解、征用与表达方面，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书写形态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从观照“童年”的时间节点来看，儿童文学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童年的“现在状态”或“将来状态”，而对于“过去状态”的童年书写则多是作家以“回忆”或“怀旧”的笔法来完成，这就自然归入于现代文学的书写范畴。简言之，中国童年生命完整形态的展示实质上是由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

共同完成的。从童年全时段的构成来勾连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符合学理逻辑，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童年书写并不局限于时间层面的贯通，还包含了成人与儿童主体转换及沟通等命题。如何在“观念童年”与“实体童年”、“阶段童年”与“关系童年”等范畴中修筑两种文学的融通之路，是当前童年研究新的热点，也是探寻两种文学复杂关系的有效方案。与“儿童视角”以功能性角色切入中国现代文学不同的是，“童年书写”更多的是从思想本体的层面来展开文学实践的，“童年书写包括以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展开的涉及童年生命情状的书写，但排除仅把儿童当作视角而不展开对童年个体生命内察的写作”^[43]。换言之，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儿童视角”，却不能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儿童视角”。后者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儿童文学并非是成人以儿童视角开展的文学创作，儿童本体是其基本内核，以视角来替换本体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中国儿童文学的成人视角”则是符合情理的，因为它考虑到了儿童文学“双逻辑支点”的特性。相对而言，“童年书写”的理论适用度要强于“儿童视角”，我们既可以探析“中国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也可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童年书写”。同时，它还考虑到了儿童年龄的阶段性与儿童文学的多层次性，在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种不同类型中，童年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配置权重，从而拓展了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对话平台。尽管如此，童年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非主流的创作现象，是一种较为含蓄、委婉、迂回的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很难直观反映现代中国的社会进程。这种童年书写的特点也限制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关联的视域，很难据此深植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整体结构中。

由此看来，上述“儿童视角”或“童年书写”固然可以为探究两种文学一体化提供视角与方法，但依然无法规避其理论的限度。科学的办法是植根于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从文学与时代“共振”或“异动”关系中探究整体性观照两种文学关系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在经历一系列历史性的裂变、转换和拓展后，现代文学从传统中国的意识

形态框架中脱逸而出，其知识化生产往往是作为时代思想方向标而言的。作为当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学科概念，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也本源于知识体系的现代转型，“被纳入一个总的历史进程”^[44]。由于内含了基于儿童“新人”的想象与设计，它注定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服务的对象是儿童，儿童相对独特的天性也使得儿童文学不会像现代文学那样直接地介入现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但总体上其参与中国现代文化与思想的建构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关于“政治论”“教育论”“童心论”的讨论与反思，集中反映了走出“自溺状态”，纳入新文学格局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

辩证地看，中国儿童文学边界的确立与研究思维的跨域并不冲突。研究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问题，要力图突破“唯西方”的路径依赖、超越“唯成人”的贬抑机制，从文学发生学的动态语境中梳理两者复杂关系的动因及形态。然而，尽管“儿童视角”和“童年书写”铺设了两者一体化研究的通道，但由于多元共生文学的批评标准混乱，使得两者的联动仍呈现出松散而非结构的症象。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两难的理论悖论：一方面要打破以单向度、非辩证的观念来重构多元共生的文学图景；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共生关系反过来又容易打散文学内部的整体性。归结起来，文学“内部”与“外部”复杂多元的关系既赋予了整合两种文学的内在诉求，但同时也因无法缝合两者“自治”与“自洽”的关系而给融通带来了诸多理论困境。针对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调整所带来的挑战，陈思和将其概括为“内涵的日益丰富与理论外壳不相容性”^[45]。这里的“内涵”主要是指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容性”要素，其有机的运作必然遵循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在机制的原则和规范。问题是，对于学科化知识的理论实践并不是先验的，运作于一种文学形态是如此，而涉及两种文学关系时情况将更加复杂。因而如何确立具有统摄力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来审思两种文学的深层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理论难题。显然，问题的解决远非简单的拼接和统合那么容易。规避了“分科立学”的可能性后果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

的一体化研究也必须正视因内涵扩容而引起的理论研究转向的议题。不过，任何由两者关系而引起的争议都将指向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是什么”“如何是”等“元议题”，而这种对本源的诘问与反思，又反过来推动了学界在此议题上的理论探索。

概而言之，“一体化”研究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是并存的。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问题显然不是无逻辑地将两者糅合在一起，来扩容中国文学的“量”，也不是按照时间的发展轨迹来比较两者的异同，更不是以儿童与成人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区隔两者，生硬地将儿童文学纳入现代文学体系之中；而是回归中国新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现场，从发生学而非本质主义的角度围绕着具有共同性的问题展开讨论，从两种文学“本位”立场与“越位”拓展的视野中来统筹，梳理其基于百年中国语境而呈现的复杂关系，为重构立体化的现代中国文学图景提供切实可行的新方略。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研究”(项目编号19YSXK04ZD)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 [1] 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
- [2]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 [3] 唐兵：《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第19页，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
- [4] 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第64—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 [5] 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第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6] 戴渭清：《儿童文学的哲学观》，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第9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7] 朱自强：《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 [8] 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徐文丽译，第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 [9] 陈伯吹、陈济成：《儿童文学研究》，第1页，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丛书社1934年版。

- [10][27] 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第125页,第48页,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
- [11] 杜传坤:《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再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12] 李利芳:《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 [13]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第2卷第4期,1921年1月11日。
- [14] 江(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1日。
- [15] 王泉根:《“曹文轩模式”与中西儿童文学的两种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
- [16] 周作人、赵景深:《童话的讨论(一)》,《晨报副镌》1922年1月25日。
- [17]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1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 [18] 彼得·亨特:《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慧玲、代冬梅译,第101页,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 [19][24] 班马:《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第393页,第400页,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
- [20] 陈平原、王德威、藤井省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 [21] 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第89页,明天出版社2009年版。
- [22]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 [23] 方卫平:《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浙江师大学报》1985年“儿童文学专辑”。
- [25] 参见吴翔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述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 [26] 郑振铎:《儿童文学的教授法》,《时事公报》1922年8月10日。
- [28] 仲密(周作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晨报副镌》1922年3月12日。
- [29] 上笙一郎:《儿童文学引论》,郎樱、徐效民译,第9页,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
- [30] 约翰·史蒂芬斯:《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张公善、黄惠玲译,第8页,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 [31]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3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 [32] 郑振铎:《〈稻草人〉序》,《文学》第92期,1923年10月15日。
- [33] 蒋风:《儿童文学概论》,第5页,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
- [34] 王人路:《儿童读物的研究》,第10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
- [35] 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 [36] 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第2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37] 马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第33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 [38] 班马:《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突破儿童文学的美学意识自我封闭系统》,《儿童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 [39]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 [40]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 [41]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第154页,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
- [42] 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 [43] 谈凤霞:《边缘的诗性追寻——中国现代童年书写现象研究》,第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44] 张福贵:《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第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45] 陈思和:《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